

紀念作家戴杜衡百歲冥誕

追懷一位畢生為自由奮鬥的文化人

● 趙廷俊（前中央日報總編輯、副社長、中華日報社長）

作者來函摘要：

秀英社長勳右：

戴杜衡先生為一才華卓越的文化人，畢生為自由寫作奮鬥不懈。民國

三十年代曾與當時左翼奉為「神主」的魯迅為寫作自由筆戰數年，雖終因孤軍無援，在左翼圍剿、孤立之下，被迫脫離文壇，投身新聞界，但其影響頗大。大陸開放後，文藝界曾多次集會研討此一筆戰史實，可見其影響之久遠。

戴杜衡曾在新聞界默默耕耘，甚

少交際，一般人並不熟悉。他曾為大華晚報、徵信新聞（中國時報前身）

、聯合報、新生報各大報同時撰寫社評，而為中央日報寫社評甚久。嗣後

又為「自由中國」雜誌寫社論、專欄。均因未署名，在中華民國聲名並不顯著，加以早於近半世紀前去世，而今知之者更鮮。弟此稿亦寫於紀念專輯出版時，為時亦久，但於戴杜衡先生平生事跡之瞭解仍不無幫助。

趙廷俊拜上

二〇〇七年四月廿二日

筆戰魯迅左派圍攻

戴杜衡先生是一位才華卓越的文藝創作和文學批評家，更是學養深厚

、觀察銳敏的評論、專欄作家，並於

經濟學有深邃研究，有專著傳世。戴先生智慧高超，文筆清新俊逸，其文藝作品和評論專欄都深切感人。他畢生一貫的理想和目標是尊重理性、維護自由。早年力倡文藝創作自由，不受任何教條束縛，與左派文人筆戰，對三十年代文藝界頗具影響；其後為各報撰寫社論，擔任「自由中國」撰稿人，均秉持自由理想，始終如一。

戴先生浙江杭州人，生於一九〇

七年，一九六四年病逝，享年五十八歲。今年為其百歲冥誕。

他的一生明顯的分為兩個階段：

一九三六年以前，青少年時期是學生運動的活躍分子，文藝作家，文藝刊物的主編和文學理論、批評家。他讀上海震旦大學時，策劃和參與過多次重要學生運動，時在一九二六年左右，國民革命軍北伐到上海之前。讀大學時就已從事文藝創作，在上海文藝界嶄露頭角。以後幾年，他創作、翻譯甚勤，作品出版的有十幾部，他又創辦主編過幾種文藝刊物，在三十年代文藝界廣受重視。後來，由於他倡文藝創作自由，不受任何教條的束縛，受到左派文人圍攻，當時和他打筆戰的，包括左派奉為巨擘的魯迅等人，而他則是孤軍奮戰，其間支援過他的，只有胡秋原先生。戴先生文筆犀利，邏輯嚴謹，學識淵博，鼓吹創作自由乃理直氣壯，左派的圍攻並不能發生作用，反而自暴其教條主義之短。但當時左派有組織、有群眾，後來採用孤立、困迫的手段，使他辦的刊物別人不敢寫稿，他的文章也沒有別

人的刊物敢登載，就這樣他被迫無法繼續奮鬥，從而結束了這場為文藝創作自由而掀開的筆戰。當時他還是不到三十歲的青年人，沒有財力和人力的支援，就憑著熱愛創作自由的赤忱和銳氣，打了一場震撼三十年代文壇的筆戰，雖未成功，也是光榮。據說，以後中共就此筆戰引起的問題所作檢討文件多達數十萬字。

對文藝失望轉寫評論

筆戰的結束，也是戴先生文藝工作的結束。他對當時的文藝界感到失望，以後轉而從事於言論評撰工作，時間約在對日抗戰之後，他也過了四十歲，進入中年。

抗戰期間他先在香港報社擔任主筆，太平洋戰事爆發，日本軍隊攻陷香港時，他被困藏匿於天主教堂，因此成為天主教徒。後來逃出香港，輾轉到達重慶，在中央日報擔任主筆。抗戰勝利，中央日報遷回南京出版，

戴先生隨著到南京，繼續擔任主筆。

南京中央日報由新聞學者馬星野任社長，積極推展業務，重視新聞編採和評論。當時從事編採工作的，多是馬先生的學生，主持言論的主筆們則是一時文章的耆宿巨擘。總主筆陶希聖先生，主筆除戴先生外，有王新命先生、盧翼野先生、張文伯先生，後來還有蔣君章先生、殷海光先生。戴先生與王新命先生是專任，寫稿較多，其餘諸位是兼任。殷海光先生是西南聯大畢業不久的青年，初來時名義是撰述委員。

中央日報於三十六年秋間為培養言論撰述人才，特設「新聞研究班」招考大學畢業生為研究員，研習社論寫作和新聞編採，共錄取十人，我是其中之一。指導我們研習者有戴先生，我在中學時讀過他所譯英國小說家哈代的「統治者」，因而對他特別注意；殷海光先生與我年事相近，又同住報社宿舍，彼此熟悉，殷先生反

抗權威心理甚強，於人少所推許，對戴先生則頗為欽心，這也增加了我對戴先生的仰讚，以後將近二十年間，交往親切，亦師亦友，無所不談。

三十七年冬，大陸情勢逆轉，中央日報決定遷台北繼續出版，除遣散的同仁外，有家眷的在那年底和卅八年初先遷來台北，單身職員於二月初來台，同年三月十二日中央日報台北版發行（南京中央日報則繼續出版到四月廿三日共軍渡江進入南京為止）。

戴先生夫婦及其掌珠在報社安排下來台北，先住在洛陽街一間小屋裡，當時正值播遷紛亂之際，大家居處生活都很侷促艱苦，但中央日報就在艱苦奮鬥中迅速成長，戴先生銳敏犀利的評論，是中央日報廣受讀者歡迎，於短期內業務蒸蒸日上因素之一。

遷台北後，中央日報總主筆仍為陶希聖先生，但他當時正隨蔣總裁僕僕於奉化、重慶等地，直到年底才定

居台北，總主筆職務實際上由主筆錢納水先生承擔，王新命先生、殷海光先生和戴先生均為主筆，我和江德成先生（與我同為新聞研究班研究員留報社工作隨社來台者）也兼寫社論。

殷先生來台不久就離開中央日報，後來在台灣大學任教，主要社論多由戴先生及錢、王二翁撰寫（當時二翁只五十七、八歲，因同仁多是二、三十歲青年，馬社長也剛四十歲，都尊稱二位為翁，四十出頭的戴先生尊稱為「公」）。一篇轟動一時，並留傳下「政治垃圾」這一名辭的專稿，就出自戴先生手筆。

直斥官僚政治垃圾

這篇題為「台灣負擔不起」的專論，刊於卅八年五月三日，署名是林阿火（特意用台灣常見的姓名），指大陸撤退來台的若干官員、委員們仍然作威風，要求省政府接待供應，耗費龐大，使正在力求節約的台灣省政

府負擔不起。文中指斥那些需索無厭的要員們為「政治垃圾」。這篇文章不僅在政治上發生了重大的影響，中央日報在言論上突出、業務上領先的地位也由此奠定。

歲月悠久，記憶有誤，馬星野先生於七十五年間接受錄音訪問時，指此文為王新命執筆，實則王新翁執筆也引起轟動的，是他在自己主編的中央日報青年周刊上所寫的「人到有錢萬事休」一文。新翁所著「新聞圈裡四十年」一書中，對生平重要文章皆有提及，未提該文是他所寫的。我在四十四年戴先生離開中央日報後，在中央日報社刊發表「懷念林阿火」一文，有明確的記述，我還要藉此說出這篇文章的一點「內情」。當時陳誠先生正擔任台灣省政府主席，這篇文章主旨是為省府紓解來自大陸撤退大員的壓力，此文刊出後，省新聞處奉指示，以讀者投書等響應，擴大影響力，我的同班同學時在新聞處任發佈

股股長，曾託我寫投書，我揣想中央日報撰刊這篇文章也可能受到過史詒或「暗示」。其實，這篇文章也並非戴先生感到滿意的作品，只因適時尖銳的批評，引起共鳴，增長了中央日報的聲勢。

戴先生於四十二年被迫離開中央日報，對他這是不公平的，卻也因此而使他更能擴大寫作空間，發揮其所長，成為各報刊爭相延請的言論專欄作者。

四十二年，陳訓畬先生出任中央日報社長，總主筆由謝幼偉教授擔任。他是張其昀先生在浙江大學的同事，一起辦過「思想與時代」雜誌，大陸撤退後到印尼的華文報紙擔任過主筆。他是研究哲學的，對新聞工作不深入，黨政情況也不熟諳，是因張其昀先生的推薦而出任，張先生當時擔任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。中央日報社長、總主筆人選，早年例由蔣總裁親自圈定，蔣總裁視中央日報為黨的

喉舌和他的代言機構，特別重視這兩項人選。謝幼偉出任總主筆由張秘書長力薦，其時正強調增強黨的秘書長權能，故未遭否定。但蔣總裁因之特別注意中央日報言論。謝先生是造詣頗深的哲學教授，新聞背景與時間觀念卻淡薄，實不宜於擔任此在政治上

甚具敏感性的職務，他常促主筆提早寫社論，以他在印尼僑報早兩天發稿為例，認為不必急就章寫稿，他又不重視新聞的變化，未及時調整增損，主筆通常在家寫社論，並不上班，因

之社論不無偏失。由於總裁的特別留意，看到認為不妥的，就紅筆勾批。戴先生有兩篇文章被批稱不當，有關的人為了對總裁有交代，後來竟然促戴先生離開中央日報。時在四十二年，大家的生活都艱苦，特由當時的第四組（文工會前身）主任沈昌煥安排，轉任新生報主筆。戴先生從重慶中央日報起，經南京到台北，在中央日報擔任主筆十一年，卻在棄車保帥的

情況下，作了犧牲。不過，帥並未能安然保住，幾個月之後，陳、謝二位也都離開了中央日報。

離開中央撰稿更忙

就戴先生而言，離開中央日報反而是他後半生的另一轉捩點，他為好幾家報社和雜誌撰寫專欄和社論，收入增加，生活大為改善。大約在四十四年和五十年之間，他同時為新生報、大華晚報、聯合報、徵信新聞（中國時報前身）寫社論，此外還被著名雜誌邀約寫專論，香港的「民主評論」而外，以「自由中國」為主，最初他和殷海光是主要撰稿人，後來有夏道平先生、宋文明先生等人。

戴先生身體弱，因而對健康情況特別注意，以至有些敏感和緊張。曾懷疑有肺結核病，其實不是，而是肺氣腫的先兆；一段時間因看書、寫稿太多，眼壓增高，又懷疑是青光眼，服用降眼壓藥無效，住進台大醫院準

備開刀，平靜休養之後，眼壓並不高。大約四十五、六年之後，身體不適的疑慮消失，健康情況轉好，以後幾年是他寫作研究最勤，生活也最安適階段。

在評論寫作方面，戴先生不僅對國內一般問題和國際情勢有深入瞭解和觀察，對於經濟問題尤精勤鑽研，當時盛行的凱因斯學說，也著有專論介紹並批判。所寫的題材甚廣，而文筆更是流暢動人，當時各重要報刊都以能延聘他撰稿為榮，但戴先生付出力最大最多的還是「自由中國」的言論和編務。

「自由中國」的主要撰稿人，我都熟識，有時候雷震先生來戴先生家談編務，我是戴府常客，因戴先生之故，也曾為自由中國寫過兩篇談歷史考證和國際問題的論述，他們並不迴避我，得以瞭解「自由中國」的若干情況和戴先生盡的心力。有段期間，戴先生實際上主持著編務，重要社論

多由他執筆，署名文章寫的並不多。

他一貫為民主自由作鼓吹，但主張理性的改革，摒棄偏見和狂熱的煽動。他在「敬悼胡適之先生」一文中，推崇胡先生畢生提倡科學與民主，反對偏激的社會主義，反對狹隘的傳統主義，可以說一生自始至終在為闡揚理性而奮鬥。其中有一段話是：「我們想到今天這個世界之所以面臨如此重大災禍，倘能冷靜地去分析一下，其基本原因之所在，可以說，主要由於理性的泯滅。如果大家都能尊重理性，不輕易為狂熱運動所帶走，就不會有人接受那些充滿排他性的偏激思想，一切極權主義的細菌就不會在人類社會裡傳播。理性可以救世，這應該是無可置疑。」（見文星出版戴杜衡論文集「免於偏見的自由」）戴先生本人和胡適之先生一樣，始終為理性主義而奮鬥。

戴先生身體較弱，朋友和工作上

要聯繫的人多主動到他家拜訪晤談。我常見到的有中央日報社長馬星野、主筆錢納水、新生報社長王民、大華晚報董事長李荊蓀、社長耿修業、中國時報發行人余紀忠、自由中國發行人雷震、撰稿人殷海光、夏道平、宋文明、教授林一新、評論作家汪彝定、楊選堂、黃紹祖同事和近鄰林家琦、江德成、王洪鈞等。戴先生除著書寫作而外，喜歡打橋牌，技藝頗高，我和內子常去陪戴先生伉儷玩牌，我們技遜一籌，但玩的卻很愉快。集郵是他長期的嗜好，集存郵票的豐富和名貴郵票之多，當時可列入全國的前幾名。平劇他也喜歡，一次朋友在他家餐會，酒酣耳熱之後，黃紹祖先生引吭高歌「聖塔露西亞」，嘹亮動聽；戴先生唱一段「擊鼓罵曹」，頗有韻味，據他說學的是言菊朋腔調。

戴先生對人熱心真誠，雖少交際，認識的朋友都樂於主動和他交往，

橋牌高手多才多藝

在十多年中，從未看到他有疾言厲色。夫人劉可侶女士是廣東人，擅長烹調，好客又樂於助人，我家小孩的衣服多是她幫忙編織，有的同事太太也找她教打毛衣和燒菜。在戴先生身體健康情況較好的幾年（五十歲到五十五歲之間），他府上經常客人不斷。

體情況的小心翼翼，事事肯聽醫生囑咐，能知悉抽香菸的不利，可能早就斷然戒菸了。

老伴去世一大打擊

文化人往往嗜飲酒，喜抽菸，戴先生早年也好杯中物。他二十多歲，已在京滬文壇負盛名，常與當時比他年長十來歲的作家們餐敘，把酒暢飲。他談到有一次喝醉了深夜臥倒路樹邊，酣睡到天亮。青年時的豪飲者，中年以後竟滴酒不沾；但香菸卻抽得很厲害，而且喜抽味道強烈的香菸，當時我也抽菸，聞到他的菸味會有不能適應之感。戴先生中年以後因於肺氣腫的疾病，抽香菸適足加重病情，早年對此病的認識了解不多，沒有及早戒菸。他講話時常氣喘，去世前兩三年行動都受到影響，他曾多次住院，似乎醫生並未深悉病情。以他對身

肺氣腫日趨嚴重之下，另有兩樁事對戴先生的打擊很大；一是「自由中國」的查禁和發行人雷震的被捕下獄，他於無可奈何之中，日夕嗟嘆；五十二年十月，他夫人劉可侶女士去世，他悲痛逾恆，病體無法支持，轉到天氣較適宜的台中，在醫院療養，五十三年十一月十七日病逝。

集。戴先生所撰言論文稿，前後何止千百萬言，惜未自珍惜，甚少保留，廷俊先收集其近作二十篇，定名為「免於偏見的自由」，由文星書局於五十四年十一月出版，以紀念其逝世週年。經濟學論原稿請林一新教授訂正，因事忙延擱，十年之後，才由戴薇小姐取回，承余紀忠先生惠助，由廷俊編印於五十四年五月出版，分贈友好。

杜衡先生的掌珠戴薇畢業於中興大學，在中國時報工作，與同事莊志寶先生相識相愛而結婚，移居美國，在維吉尼亞州距首都華盛頓不遠的溫契斯特地方經營旅遊業，卓然有成。育有三子，皆英挺秀發。

戴先生逝世後，友好曾議定分別就其遺作編為三種書：一是言論選集，二是經濟學論集，三是文藝作品選

去年廷俊赴美，晤及戴小姐及其夫婿，晤談中深以戴先生早期文藝創作未能搜集出版為憾。返台後晤及老友周錦先生，他是近代中國文學的勤研究和批評家，搜存資料甚為豐富，承告集存有戴杜衡先生早期文稿多種，願編輯有代表性者由其主持的智燕出版社出版。盛誼隆情，令人讚佩；經轉告戴薇小姐暨莊志寶先生，尤為欣愉與感念。戴先生誕辰為陰曆五月十四日，今年（二〇〇七）折算為陽曆六月廿八日。